

论 文 献 学

王 余 光

“文献”一词，早在两千多年前的中国汉语里就已经出现了。孔子在《论语·八佾》中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在这里，“文献”是指文字资料和贤能的人。元代马端临在《文献通考·总序》中对“文献”作了较为具体的诠释，他认为，凡经史、会要、百家传记等书，信而有征者，谓之文；凡臣僚之奏疏、诸儒之评论、名流之燕谈、稗官之记录等，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谓之献。可见“文献”是指文字资料和言论资料。这一意义一直到今天仍然是适用的。

中国文献历史悠久，从甲骨文算起，已有三千五百多年的历史了。文献在流传过程中，往往由于真伪、是非、残缺、语言等种种原因，造成人们阅读和利用的不方便，这样，文献整理就成了一项十分必须的工作。早在春秋末年，孔子就整理过《尚书》等文献，这是我国私家整理文献的开端。汉成帝时，政府组织人力整理藏书。自此以后，我国各个时期，对文献的整理几乎从未间断过。随着文献整理的广泛深入开展，一些专家在文献整理实践的基础上，随着对文献的认识和理解的加深，对文献整理的经验进行总结，写出了一些文献整理的理论与方法的著作，这些著作奠定了文献学建立的基础。然而，作为一门有理论系统的学科，文献学还正有待于建立。

本世纪以来，学者们开始重视对文献学进行理论研究。1928年，郑鹤声、郑鹤春写有《中国文献学概要》一书，他们在该书的《例言》中认为：“结集翻译编纂诸端，谓之文；审订讲习印刻诸端，谓之献。叙而述之，故曰文献学。”从这本书的内容来看，它主要是研究文献整理的一些问题。目前，比较有影响的文献学著作是张舜徽先生1982年所著的《中国文献学》。作者在书中认为，我国古代，无所谓文献学。过去称的校雠学，相当于今天的文献学。我们应“很好地继承过去校雠学家们的方法和经验，对那些保存下来了的和已经发现了的图书、资料（包括甲骨、金石、竹简、帛书），进行整理、编纂、注释工作。使杂乱的资料条理化、系统化；古奥的文学通俗化、明朗化。并且进一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条别源流，甄论得失，替研究工作者们提供方便，节省时间，在研究、整理历史文献方面，作出有益的贡献，这是文献学的基本要求和任务。”^①很显然，张舜徽先生是把对图书、资料进行整理、编纂、注释等工作，看作是文献学的主要内容。这里，我有两点不同看法：（一）文献整理，内容包括辨伪、版本、校勘、辑佚、注释、目录等，是具体的学术活动，不应看成是文献学的本身。（二）如果把文献学看作是研究文献整理的理论与方法的一门学科，那么，这至少是不全面的看法，这样的文献学是传统的文献学，或者称为文献整理学更为准确。

198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王欣夫的《文献学讲义》，作者在该书的《绪言》中认为：

马端临的《文献通考》所包括的内容就是广义的文献学，但“广义的‘文献学’是无法在课堂上讲授的；然而，既称为‘文献学’，就必须名副其实，至少要掌握怎样来认识、运用、处理、接受文献的方法。这方法要能够执简御繁，举一反三，譬如一把多种形状的钥匙，可以开启多样形式的锁。书籍既是智识的宝库，对它怎样开启，进一步怎样发掘、整理，就是一个重要问题。”作者根据前人积累的经验，将文献学的内容规定为目录、版本、校讎三项。作者认为：目录是为了介绍文化遗产，版本是为了检择可靠的材料，校讎是整理材料的方法。这里，王欣夫所说的文献学，实际上就是宋代以来的校讎学。张舜徽先生在四十年代曾认为目录、版本、校勘之学，三者俱校讎之事。^②事实上他近年所讨论的文献学，也就是在校讎学内容的基础上加以增益的结果。

我在1986年写《中国历史文献学》一书时，对文献学研究的范围也有所论及。当时我认为：文献学是以文献整理的各方面及其历史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具体说，文献学要研究文献整理的对象、整理的内容和方法及文献整理的历史。首先，要研究文献整理的对象。文献整理的对象即是文献本身，一个文献整理家，如果不对文献有所了解和认识，那么整理工作是难以开展的。文献学不仅要研究每一个体文献的材料来源、编著过程、体裁、体例、内容及其价值，同时，文献学还要把文献作为一个文化实体去揭示它的产生和发展的原因、过程，研究各个时期文献的特点及各个时期文献的继承性。文献学对文献的研究为文献整理提供了科学的基础。其次，要研究文献整理的内容和方法。前人文献整理的内容和方法主要有辨伪、版本、校勘、辑佚、标点、注释、翻译、书目、索引等。文献整理的内容和方法主要要解决三个问题：一是要实证文献的真实性、原本性与完整性，这就有了辨伪、版本、校勘、辑佚等方法；二是要解释文献的语言与内容，这就有了标点、注释、翻译等方法；三是要解决文献的排列顺序，为人们认识和研究文献提供方便，这就有了书目和索引等方法。文献整理的上述三个问题是相互联系的，通过文献整理，人们可以有效而准确地获得可靠的、易于理解的文献。再次，是对文献整理历史的研究，文献学要考察我国文献整理的发展过程，总结前人文献整理的方法和经验，为今天文献整理的实践服务。^③现在看来，这样的规定仍然是不够全面的。

那么，一门有理论系统的文献学应该是怎样的呢？也就是说，在现时代，文献学应当担负起怎样的使命呢？

首先，文献应当是文献学的研究对象或研究主体，就是说，文献学不仅是把文献作为自己的研究手段，同时也作为自己的研究目的。历史学、文学史、哲学史等许许多多的学科，它们都需要研究文献，然而，它们研究文献只是作为一种研究手段。如历史学，它研究大量的历史文献，目的在于通过这些文献资料去揭示某一历史规律或某种历史现象，文献成为它的研究手段。文献学则不然，它研究文献，目的就在于要揭示文献本身。文献作为文献学研究的主体，使文献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有了可能。

其次，文献学既是以文献为研究主体，那么，它应当是全面而系统地研究文献的一门学科，而不应仅摄取文献的某一方面或某一特征加以研究。

基于上述两点认识，我们对文献学内容的描述就有了一个基本的框架，而文献学内容的具体构成又是受文献本身的特点所制约的。首先，文献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如同其他文化实体一样，有自己独特性的一面。因此，文献学要揭示文献的属性与构成，阐述文献的制作、流传、收藏的全过程，并从文献利用的实际角度出发，研究文献整理与揭示的方法和原则，为文献整理和揭示的工作提供理论依据。其次，文献又是一种历史文化的产物，它有

着自身的发展规律和发展历史，这样，文献学必须要把文献放入历史过程中去考察文献的发展、兴衰与历史过程中各因素之间的关系。再次，文献是社会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献在人们生活和人类文化的继承和创新等方面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是文献学所不能不研究的。

1. 文献的属性

文献是属于文化的范畴。关于文化，前人已作过很多定义，这里不再赘述。我认为，文化是人的精神作用于外部世界的结果，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创造出来的一个有别于物质世界，也有别于精神世界的特殊领域，这个领域可称之为“文化世界”。文化的内容大略可包括三个方面：(1) 人的规范的总体，如义务、价值、道德、教育等；(2) 人类社会的总体，如家庭、民族、国家等；(3) 客观知识的总体，如宗教、艺术、科学、语言、文献、机器等。很显然，文献是文化中客观知识总体的一个部分。知识以其存在形式可划分为主观知识和客观知识两部分，主观知识存在于人的脑子里，随着人的死亡而消亡，客观知识存在于人的脑外。文献就是客观知识与物质形式的统一体，其内容是客观知识，形式是竹木纸张等物质实体。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说：“不管是科学书籍还是文艺书籍，一本书是一种物理对象。……但是使它成为人类精神品的重要产物是它的内容。版本不同，内容依然不变。”^④这样，我们对文献的属性就有以下两方面的理解。一方面，文献不能纯属物质的范畴。我们平常提到的文献，不是指文献的外在形式，而较多的是指它的知识内容。现有一本历史书，一本物理书，假定它们的印刷、装帧、纸张等物理属性是相同的，然而它们仍不是同一本书。相反，我们所说是一样的书，比方《中国史学发展史》，却可能属于不同的版本，物理属性全然不同，假如所有这些版本都包含同一内容，即同样的句子序列，那么，它们实际上是同一本书。这就是说，知识内容成为文献的根本属性。另一方面，文献也不是属于精神的范畴，因为它们一经产生，就完全脱离人脑而独立存在。

2. 文献的构成

文献学关于文献属性的研究对进一步探讨文献的构成奠定了基础。文献是一定的物质属性（具体形态）与一定的知识内容（抽象形态）的统一体。文献的具体形态主要由如下四个部分组成：(1) 文字形式。文献的知识内容必须要通过一定的文字形式才能得到体现。文字形式又可分为两种，一是不同语种的文字形式，如汉文、藏文、英文等；一是同一语种的不同语言形态，如汉语中的文言文、白话文等。目前有人认为，文字不是文献的唯一记载手段，文字之外，诸如图画、符号（如乐谱的音乐符号）、声频、视频等手段记载的知识，这些知识实体也可称为文献。这一问题尚有待进一步的研究。(2) 载体形式。文献的知识内容通过文字手段，又必须要体现在一定的载体上。目前所知，世界上最早的文献是楔形文字文献。约自公元前四千纪末期开始，一直到公元前一世纪，楔形文字曾被用来书写过许多语言，最早的楔形文字文献是苏美尔语文献。这种文献是用一支斜尖的笔划写在软泥板上的。可知最早的文献载体是软泥板片。在古代，印度人以棕榈叶为书写材料，埃及人用纸草作为书写材料，后来把经加工过的羊皮作为“书写的纸”。在中国，最早的文献是甲骨文，龟甲和兽骨成为文献的载体，后来代之以竹木布帛，直到纸的发明。纸成了目前世界上最通用的文献载体。随

着科学的发展，如胶片、胶卷、磁带等新型的文献载体也出现了。(3)书写形式与印刷形式。印刷术发明之前，文献是以手写的形式出现。印刷术发明后，写本仍然存在，只是不作为主流而已。在中国古代，印刷术的发明，文献始用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近代以来，文献的印刷逐渐运用铅印、石印和影印等。(4)装帧形式。在中国主要有卷轴装、旋风装、经折装、蝴蝶装、包背装、线装、平装和精装等。文献的装帧与文献的载体和印刷极有关系。近代前期，文献是用手工雕版印刷或活字印刷，使用软纸和线装。机器印刷术输入中国后，纸张和装帧也随之发生了变革，原先手工制作的软纸不仅产量低，成本高，不能满足书籍的大量生产，而且软纸不便双面印刷，相当不适用，这样“洋纸”就应运而来取代了软纸。“洋纸”进行双面印刷，原先的线装就不得不改革，因而新式图书的平装和精装也就产生了。

文献构成的另一方面是文献的抽象形态。抽象形态包括文献的知识、体裁与体例。知识内容是构成文献的必要因素，正如卡尔·波普尔所说：“几乎每一本书都是这样：它包含着客观知识，真实的或虚假的，有用的或无用的。”^⑥与知识内容相联系的是文献的体裁与体例问题。体裁与体例都是知识内容的表现形式。体裁往往是就各类书（或文章）之间的不同的表现形式说的，如文学作品有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史学著作有纪传体、编年体、章节体等。体例是指一书内容的组织结构和表述形式，如书中的记时、记地、记人的方式，标目、征引的格式等，都是体例的具体表现。

文献学对文献构成的研究，不仅使人们具体认识了文献的各个组成部分，同时为文献的分类研究提供了基础。文献的分类是以文献构成中某一特征来作为分类的标准的。以文字形式分，则可分汉文文献、英文文献、藏文文献等；以载体形式分，则可分为楔形文献、甲骨文献、帛书等；以文献的知识内容分，则可分为文学文献、历史文献、数学文献等；以体裁形式分，则可分为散文文献、戏曲文献、编年体文献等。

3. 文献的编作、流传与收藏

上述两个问题是对文献主体的直接研究，在这个基础上，文献学需要研究文献从形成到被收藏这一完整的运行过程。文献的形成分为两个环节，即文献的编撰和文献的制作。文献的编撰又可分为编撰方式和编撰过程两个问题。编撰方式，自古以来主要有作，或称著、撰等，这是作者的创造，孔子所谓“述而不作”，就是说只阐述前人成说，自己不敢有所创始。又有记，或称志，是记录、记载，非专尚议论，以叙事识物为主。编写，或称编撰、编纂，是就现存的材料加以整理，写成文章或书。编辑，是对资料或现成的作品进行整理、加工。编撰过程，是研究文献在编撰中所依据的材料。研究文献的编撰方式和过程，更有助于对文献内容的理解和文献价值的揭示。文献形成的另一环节是文献的制作。制作的内容包括对文献原稿的加工、设计、制版、印刷和装帧的过程，这就是通常所说的编辑与出版。同一文献可能会经过多次编辑和多次刊印，这样就会形成多种版本。一本书的不同版本，往往反映了该书的内容和形式的不同。

文献无论是原始的手稿，还是经过传抄、刻印或出版，形成各种抄、印物或出版物，它都有可能社会上流传，流传是文献社会意义的重要手段。文献的流传可分为两种形式，一种可称为市场性流传，一种可称为阅读性流传。文献进入市场流传，就成为一种商品，可以标上价格，在书场、书肆或书店中出售。文献阅读性流传是通过阅读进行流传，文献只有被阅读，其内容才可能得到流传和利用，这也是文献的社会意义和生命力所在。

文献的收藏，不是文献流传的终结，而是文献流传的手段或途径之一。自古以来，无论是公藏还是私藏，其藏书的目的或供人阅读和利用，或为流传后世。司马迁所谓“藏之名山，传之其人”，藏还是为了传。无论从空间意义还是从时间意义上说，流传是藏书的价值所在。

文献的编作、流传和收藏三者是相互影响和制约的。文献的编作量影响着文献的流传量与收藏量，流传途径的广泛与畅通与否，制约着文献的出版与收藏，收藏能力的大小又直接影响到文献的出版与收藏。

4. 文献的积累与兴衰

藏书为文献的积累提供了条件。中国人藏书，是个由来已古的嗜好，中国文献的积累浩如烟海，这两者是有直接联系的。研究历代文献的类别和数量，以从中窥探中国文献的积累、兴衰与发展，这是文献学一项十分重要的课题。

据有关统计，我国于1980年以前，各时期出版的图书共计有809157部，其中：

西汉及西汉以前(公元前25年前)	1033部	宋(960—1279年)	11519部
东汉(25—220年)	1100部	辽金元(906—1368年)	5970部
三国(220—280年)	1122部	明(1368—1644年)	14024部
晋(265—420年)	2438部	清(1616—1911年)	126649部
南北朝(420—589年)	7094部	民国(1911—1949年)	100000部(约数)
隋唐(581—907年)	10036部	解放后—1980年	527402部⑥
五代(907—960年)	770部		

以上统计，仅是图书的数量，尚不是文献的全部。图书以外，目前出土的甲骨文献有15万片，带有铭文的商周青铜器上万件，石刻资料约20万件，发现的简牍约4万枚，敦煌遗书约5万卷(件)，吐鲁番文书2700多件。历史档案约3000万件，尚不计海外和非档案馆单位所藏的历史档案。此外，近代以来，我国还出版印刷了大量的报刊文献和内部资料。

从这些统计数字可以看到：(1)中国丰富的文献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这一积累不仅是旧文献的保存，同时也是新文献的增加。(2)中国各个时期文献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这体现在文献发展过程中的兴与衰。为什么文献发展过程中会出现兴与衰呢？这我们只能从时代的大背景中去寻求答案。

政治与文献。时代政治不仅影响旧文献的保存，而且也影响到新文献的增长。秦始皇焚书，使大批先秦文献失传，这就是政治的原因。隋代学者牛弘论历史上书有五厄，这五厄都是政治与战争的原因造成的。十年动乱期间，大批文献被毁，而出版书的种数也大大下降，据统计，1949年至1965年这十七年中，平均每年出版图书21695种，1966年至1976年十年中，平均每年出版图书下降到8351种。⑦政治对文献内容的影响作用更大，且不说十年动乱期间出版的图书都是清一色的政治宣传读物，就是在中国历史上，历代王朝，无不剪制与本朝统治思想违迕之书。明清两朝屡兴文字狱，不仅祸及其书，亦祸及其人。

学术与文献。学术的繁荣，促进文献的发展，战国百家争鸣的学术环境，就产生了百家诸子之书；汉代，特别是东汉，好五行灾异之说，因此讖纬之书大兴；魏晋南北朝谱学的兴起促进了谱牒之书的繁荣。且以谱牒之书为例，当时，社会上十分重视门第、血统，因而研究这一门阀制度的谱学就发展起来，随着谱学的发展，谱牒著述十分丰富，仅三百余年间，就有五百余部，上千卷的谱牒著作问世，并且门类众多，有帝王谱、宗室谱、百官谱、百家谱、

英贤谱、氏族谱、家谱等等。很明显，一个时代的学术风尚不仅能促进文献数量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文献门类的增多。也就是说，文献门类的增损是与时代的学术风貌紧密联系的。谱学盛于魏晋南北朝，《隋书·经籍志》设谱系类，而唐以后，门阀制度受到冲击而逐步退出历史舞台，谱学失去了自身存在的社会基础而走向衰落。《四库全书总目》不设谱系类，其原因是：“自唐以后，谱学殆绝。玉牒既不颁于外，家乘亦不上于官，徒存书目，故从删焉。”^⑧谱学既绝，而极少的谱牒之书又不流布于世，这样设立谱牒类就没有实际意义了。

科学技术与经济能力对文献的出版、流传、收藏都有着决定性的影响。科学技术的发达，才有可能大批量地生产纸张，更新文献的印刷和装帧技术，加快文献的出版速度和扩大出版量，也才有可能加快文献的流通速度，开拓广泛的流通途径。一个社会的文献收藏量与这个社会的经济能力直接相关，人们只有在衣食丰足之后，才有可能去藏书读书。

5. 文献的整理与揭示

文献整理是一项由来已久的工作，也是传统文献学研究的课题。文献之所以需要整理，是由于文献在流传和积累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所造成的。这些问题主要有：（1）文献原本性、完整性和真实性问题；（2）文献是否具有普遍的可读性。解决这些问题是文献整理的主要任务。在这里，文献学是把文献整理作为一个重要方面加以讨论的，这种讨论旨在建立一套系统的文献整理的思想与方法。前人整理文献，重视广泛搜求材料，反对主观臆测，强调尊重事实，尊重证据，实事求是，并且能以历史的客观的态度对待文献遗产。这些思想对我们来说，仍然是值得继承和发扬的。总结前人文献整理的方法，主要有辨伪、版本、校勘、辑佚、标点、注释、翻译等，这些方法主要是要解决文献的“言”与“义”的关系问题，整理者要证实文献中的“言”的确实性，然后再求这“言”所蕴含的确实的“义”。这样就有一系列问题牵连在一起，如文献中的“言”是不是原本的、真实的、完整的，这就有辨伪、版本、校勘、辑佚等方法。文献中的“言”应如何解释，是求其作者的本义，还是借“言”来发挥解释者的思想，这就有了标点、注释和翻译等方法。

证明“言”的真实性、原本性、完整性，是文献整理首先要进行的工作。整理者运用自己的知识和经验提出疑问，然后再根据疑问去广泛寻求证据，以证明自己的疑问正确与否，我们把文献整理的这一过程称之为文献的实证。在证实“言”的可靠性的基础上，进一步的整理工作是对“言”的解释，所用的方法如标点、注释、翻译等，我们把文献整理的这一过程称之为文献的解释。文献整理要达到的一个总体目的，就是确定文献原文的真实可靠性，方便人们理解和利用原文。文献实证是通过辨伪、版本、校勘、辑佚等手段，力求恢复文献的原始面貌和内容的真实性，使之成为人们研究和利用的真实可靠的材料。在这基础上，整理者通过标点、注释、翻译等手段，从事对文献的解释，使人们能更准确地理解原文，把握作者的原义。

文献揭示与文献整理往往是两项紧密相连的工作。从中国古代以来，就不断有人在文献整理的基础上，再编制书目或索引，撰写提要。对文献进行编目、索引、提要，是文献揭示的主要内容，也是文献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一方面，文献揭示是要对文献进行序列揭示，即处理文献的“无序”与“有序”之间的关系问题。所谓“无序”，即是说，存留下来的文献是一种无序纷乱的状态，这不仅从文献的整体上看是这样，从个体上看，一本书的某些内容也是不相联系的，如书中的人名、地名等。因此，人们根据实际需要，将无序纷乱的图书按一定的规则或类例编成书目，把一些分散的资料、论文、

或一书或数书中相关的内容，编成索引，使之达到一种井然有序的状态，我们把文献揭示的这一过程称之为文献的整序。文献的整序是要把文献某一主题、或某一学科、或某些自然的词、句顺序系统地揭示给读者。

另一方面，文献揭示还可以通过提要(或摘要)、评述、综述等形式，把文献的内容揭示给读者。提要是文献内容揭示的重要手段，汉代以来，我国许多文献学者们在编制目录的同时，都作有文献提要，今天许多藏书目录或新书报道目录上都载有图书提要，以便人们具体地了解文献。

6. 文献与文化的传播和继承

文献学不仅把文献作为一种文化实体进行全面研究，同时也把它作为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考察它在人类社会和人们生活中的作用和影响。

文献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是以文献的流传为前提的。首先，文献的流传，就会带来人类文化信息的传播，加强人们思想、感情的交流，促进人类经验、知识的传递。俗话说：“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正是指出文献在传播信息方面的重要意义。可以说，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几乎无法估量那大量的图书和报刊杂志等一系列读物在人们生活的各方面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其次，从历史的角度看，文献流传的时间性，形成了有效的人类文化的储存功能，为人类文化的继承提供了条件。文化的继承，“新一代便不必去寻找已经找到的东西，发掘已经发现的东西，发明已经创造出的东西。对文化遗产的了解，会有助于人们去考虑古代人的劝告：不要去做已经做过了的事情。按照已经达到的作为出发点，社会便缩短了通向实现自己目标的路程。”^⑨文献所保存的前人的文化知识，不仅节省了下一代人的时间和物质消耗，同时也为下一代人从事新的文化创造打下了基础。司马迁写出《史记》，在史学上是一重大创新。考察《史记》的写成，可以看到司马迁的创造也是根基于前人的史学遗产。《史记》有本纪和世家，是编年体形式的，这取法于《春秋》、《战国策》等书；有十表，取法于《五帝系牒》、《春秋历谱牒》等书；有八书，为专门史，可能滥觞于《周官》、《世本》等书。在材料上，《史记》中的许多内容取自前代的《尚书》、《春秋》、《左传》、《国语》等书。可以说，文化继承与文化的发展是不可分割的，继承性是人类文化进步中过去同现在与未来相联系的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一个民族的文化创新，只有当它保持过去文化业已取得的一切优秀的东西，才会为这个民族普遍认同，并能在长时期内保持自己的特色和影响。文献为人类文化的储存和文化的继承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注释：

①张舜徽：《中国文献学》，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第4页。

②参见张舜徽《广校雠略》，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页。

③参见王余光《中国历史文献学》绪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④⑤〔英〕卡尔·波普尔：《世界1、2、3.》，载《自然科学哲学问题》1980年第1期。

⑥⑦材料引自《从统计数字看中国图书出版事业的发展》，载《图书情报工作》1982年第1期。

⑧《四库全书总目》卷四五。

⑨〔苏〕尼·瓦·贡恰连科：《精神文化》，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第49页。